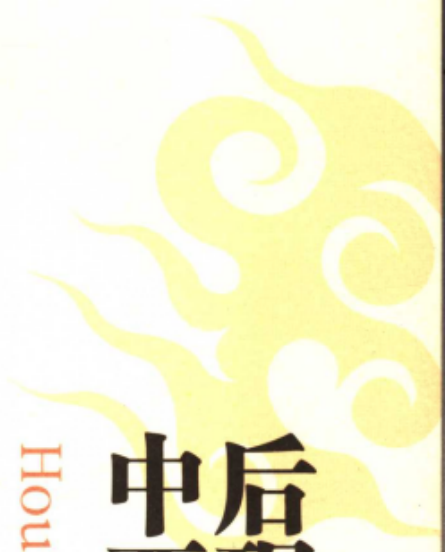


王晴佳 古伟瀛 著



后现代与历史学： 中西比较

Houxiandai yu Lishixue:
Zhong Xi Bijiao

主编
陈启能

文
前沿书
人前丛

山东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由两位长期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研究的专家通力合作而成,对近期影响颇大的后现代主义及其与历史学的关系作了深入浅出、全面周到的解释和评述。本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对后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主要内容和特点作了详尽而又通俗易懂的全面介绍;第二部分结合 20 世纪的西方史学,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第三部分探讨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问题,具体分析了一些具有后现代意识的中国史著作。

ISBN 7-5607-2684-4



9 787560 726847 > 定价: 30.00 元

人文
前沿
丛书

主编
陈启能

主编
王学令
副主编
王孔姜

后现代与历史学：
中西比较

Houxiandai yu Lishixue:
Zhong Xi Bijiao

王晴佳 古伟瀛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王晴佳,古伟瀛著. —2版.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1

(人文前沿丛书/陈启能主编)

ISBN 7-5607-2684-4

I. 后...

II. ①王... ②古...

III. 后现代主义—史学—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4556 号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250100)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 格: 720×960 毫米(1/16)

印 张: 15

字 数: 266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2 版 2006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人文前沿丛书

The Frontiers of Humanities

主 编 陈启能

副主编 王学典 孔令栋 姜 芃

顾 问 (以姓氏的英文字母为序)

Carlos Antonio Aguirre Rojas

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吉雷·罗哈斯,墨西哥

Jerry Bentley

杰里·本特莱,美国

Peter Burke

彼得·伯克,英国

Charles Burton

查尔斯·伯顿,加拿大

Alexander Oganovich Chubarian

亚历山大·奥加诺维奇·丘巴里扬,俄国

Brian L. Evans

布赖恩·埃文斯,加拿大

Usha George

乌莎·乔治,加拿大

Carlo Ginzberg

卡罗·金兹伯格,意大利

Yvonne Herbert

伊万尼·赫伯特,加拿大

Dirk Hoerder

狄克·霍德尔,德国

Georg G. Iggers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美国

Juergen Kocka

于尔根·科卡,德国

Chris Lorenz

克里斯·洛伦兹,荷兰

Boris Nikolaevich Mironov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

Lorina Petrovna Repina

洛里娜·彼得罗芙娜·列宾娜,俄国

Joern Ruesen

约恩·吕森,德国

Richard Vann

理查德·范恩,美国

Immanuel Wallerstein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

Q. Edward Wang

王晴佳,美国

Hayden White

海登·怀特,美国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守和	于沛	王 昺	朱政惠	齐 涛	刘家	和
李幼蒸	何 平	何兆武	陈 炎	陈 恒	陈筠泉	
周春生	赵轶峰	郝名玮	倪培耕	曹特金	傅有德	

序

有关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近来在海峡两岸的中文学术界，引起了不少兴趣。但就研究的论著来看，似乎主要集中在文学和哲学等领域，而在史学界的反响较为迟缓，论著也相对较少。^① 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就是填补一下空白。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提供了一些我们所能找到的例子，用来探究和说明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之间的联系，以供史学界有兴趣的同仁参考。

饶有兴味的是，虽然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反应比较迟钝，甚至表现出有点事不关己的态度，但就后现代主义的内容来看，应该说对历史研究的冲击最为猛烈。我们在导论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解释，这里只是想将一些重点强调一下。

首先，从后现代主义对普遍理性的攻击而言，它就直接质疑了启蒙运动以来思想家试图在历史演变中寻求规律或通则的企图。如果我们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观点，那么对历史研究的目的就当会有不同的认识。

其次，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的思维模式提出质疑，认为那种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说理、论证的做法已经不再为时人所采用，取而代之的是用多变的色彩、强烈的感觉变化、没有逻辑联系的影像组合来达致一种突兀、奇特的印象，由此来传达信息，获得传播的效果。因此，历史学家那种用历史叙述的方式，慢条斯理、娓娓道来的做法，就不再受人青睐，而隐含在这种叙述方式背后的历史演化进步

^① 有关论著，请见本书导论注③，此不赘列。对于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的关系，《史学理论研究》较早就有文章探讨，如张永华的《后现代观念与历史学》（见该刊1998年第2期）。王晴佳在台湾的《新史学》有《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一文（见该刊第10卷第2期，1999年6月）。

的观念,也随之而遭到抛弃了。

复次,后现代主义者还对现代人对语言的认识加以修正。在他们看来,语言本身并不透明,而是有其内在的结构。人们使用语言来表达思想,就必然受其制约。而且,由于语言本身包含语音和语义两项,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而转移,因此即使当面解释,也不一定能表达得完整无误,何况用书写的形式。由此,历史学家想通过文字来如实描述过去,就显得有点痴心妄想。事实上,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史家的写作,不但受控于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时代条件,而且还受到所使用的语言风格的限制。换言之,即使有几位政治见解相同、文化背景类似,并在同一时代就同一题目写作历史的史家,他们的著作,还是会体现出风格的不同。这就表明:历史学家的著述,必然受到语言的控制;历史著作无法表现真实的历史。

如此看来,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我们对历史研究的认识,从研究的目的、手段到形式,都会有相当的不同。那么,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的这一强烈挑战,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呢?就我们所知,在中文的学术界,似乎有这样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和思想界所产生的新潮,表现的是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社会发展的一种批判与反思,而与中国的社会,特别是大陆,关系不大。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尚未完成,因此就没有必要谈论所谓“后现代”。另一种则对后现代主义表现得十分热衷,把它视为一种学术界的最新思潮,代表了未来的走向,因此便趋之若鹜,以此来标榜其学术的“先进”。笔者以为,这两种态度,都有修正的必要。

就其思想渊源来看,后现代主义的确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出发点是为了总结、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向及其对全球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并不应该就此认为后现代主义仅仅与西方社会有关,而非西方的地区没有关联。事实上,由于资本主义在现代的发展,特别是在“冷战”以后的发展,已经对全球社会产生了举足轻重、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后现代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应该对中文学术界也有不少可以资鉴的地方。

如果认为后现代主义仅仅与西方社会有关,而与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无关,这至少在认识上有两个错误。首先是把“现代”与“后现代”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这种观念本身就受到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重要影响,即把历史的演化视为一种一线发展、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而后现代主义

批评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摒弃这种历史观念,将历史的发展视为一种多元的、开放的过程。因此,我们不应该把“现代”与“后现代”视为是一种历史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应该把后现代主义的产生,视为是一种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反省。

其次,这种反省,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没有关联,而是关系甚大。由于历史的原因,资本主义在西方比较早地产生与发展,使得西方社会较早进入现代社会,因此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运动,不管是在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都无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影响。但是,这里的“西方”,本身是一个集合的构成,是西欧与北美各个西方社会的一个综合代名词。换言之,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模式,而是表现出多元性,也就是“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y)。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发展多元性的重视,能够使非西方地区的人士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注意到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因而在设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时,注意到自身的时间与空间之独特性,避免用一种划一的眼光来制定现代化的规划。这种对多元现代性的认识,在目前的海峡两岸都有急切的需要,而对现代化正如火如荼的大陆,似乎更有必要。

因此,我们研究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由于它对我们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其实,这种赶时髦、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学术新潮而刻意搬用的做法,也正好是后现代主义所要批判和摒弃的。如前所述,后现代主义的出发点之一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作出批判性的反省,特别是要检讨西方的“知识霸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因为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学术界的新潮而加以模仿,那就正好忽视了它的高度批判性,也就正好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加固了西方的“知识霸权”,使得中文学术界永远矮人一头,永远走不出西方的阴影。

事实上,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对知识的认识,都应该具有多元的态度,不再以一种单一的模式为模仿、赶超或者批判的对象。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对自身的文化遗产及其在现代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20世纪以来,中文的学术界对西方学术,往往抱持一种既羡又恨的态度,因此在具体做法上,不是全盘西化,就是彻底批判。这种态度固然是建立在反省19世纪“中体西用”基础上的,但似乎经过一个世纪的探求,也没有提出更好的办法来。而从现今学术界的状况来看,似乎用“西体中用”更为切实,因为我们的话语形式、教育体制和知识结构,已经在根本上“西化”了,只是我们所“用”的还是中文而已。对此,我们也

不必过于伤感,因为这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但是,在新的世纪,我们似乎也应该对此有所反省。这里,虽然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但其批判反省的态度,对我们应该有所借鉴。中国是一个富有历史感的民族,对历史的总结是我们所长,这种总结自然也包括对过去的针砭,以求对未来加以更好的规划。如果本书能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总结有所帮助,并对“后 20 世纪”史学和学术的发展有所启发,也就达到了我们的写作目的了。

本书的写作,开始于 1999 年春,我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研究期间。我的合作者古伟瀛,现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届时正好也在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访问研究。我们在写作中作了如下的分工:由我负责导论、第一和第二部分,他负责第三部分和“要理问答”。在写作完成以后,又由我初拟了“参考阅读书目”,古伟瀛教授作了全书的人名索引。本书送往出版社时,我已离台返美,因此本书的校订工作,完全由古伟瀛教授一人承担,期间辛劳,我没有分担,十分不安。本书由台北巨流图书公司于 2000 年出版。该公司的熊岭和熊正平先生对本书的写作,从一开始便多有关照,我们非常感激。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巨流图书公司的总编辑陈巨擘先生也做了不少具体工作,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承陈先生美意,也使得我们能在大陆出版本书的简体字版。

本书大陆版能由山东大学出版社顺利出版,全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陈启能研究员的推荐和帮助。多年以来,我虽然身在海外,但与陈先生有不少交往,成了很好的朋友。早在 1986 年我来美以前,他就邀我替他主编的《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写有关世界史理论、方法及外国史学史研究的概述。承蒙他和他的同事的帮助,我又得以经常在世界史研究所主编的《史学理论研究》(原名《史学理论》)的刊物上撰稿,发表论文、译作和报道。陈先生在百忙之中,又对本书的大陆版作了校订,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使我感激万分,对此谨致诚挚的谢意。本书的修订出版,又蒙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费心支持,并再次作了校订,使我们感激万分。但本书所含之错误,仍应由我们作者负责。

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不少友人的鼓励和帮助,如黄进兴、卢建荣、周樱楷、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张瑞德、周婉窈、沈松桥、李海燕等,特此致谢!

1999 年在我写作书稿的期间,我曾应邀在台湾的清华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演讲。完成本书稿以后,我又应邀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就

本书内容作了数次演讲,在此谨向北京大学的张芝联教授、董正华教授,四川大学的罗志田教授、王廷之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学昌教授、余伟民教授以及他们的同事表示感谢,并对以上各校参与读者讨论的师生,表示我由衷的谢忱。

王晴佳

2001年6月4日

美国费城南郊

目 录

序.....	(1)
导 论.....	(1)
一、现代历史编撰学的缘起	(2)
二、从“现代”到“后现代”	(5)
三、文史不分家?	(9)
四、余 论	(15)
第一部分 后现代主义简介	
第一章 后现代主义的缘起	(21)
一、后现代主义面面观	(21)
二、语言学与后现代主义	(24)
三、从现代到后现代	(27)
四、后现代性及其表征	(31)
第二章 向“大写历史”挑战	(38)
一、启蒙运动与“大写历史”	(38)
二、“历史主义”的瓦解	(42)
三、后现代主义与妇女史	(46)
四、后殖民与后现代	(48)
第三章 语言、文本、历史	(54)
一、从“上帝之死”到“作者之死”	(54)
二、历史写作等于语言游戏?	(59)
三、作者、读者、文本	(62)

第二部分 后现代史学的发展

第四章 20 世纪的西方史学	(69)
一、科学崇拜与科学史学	(69)
二、年鉴学派与历史观念的更新	(74)
三、“历史的社会科学”与社会史	(79)
第五章 历史学的多样化	(86)
一、考察历史的多种角度	(86)
二、小历史、微观史、日常史	(92)
三、历史研究的分化组合	(98)
第六章 后现代史学	(105)
一、历史等于文学?	(106)
二、历史记忆与历史真实	(111)
三、后现代主义批判	(116)

第三部分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

第七章 传统史学受到的挑战	(123)
二、史料的选择及批判	(125)
三、历史解释	(129)
四、历史叙述	(133)
五、史学研究的策略及取向	(138)
六、史学的辅助科学	(139)
七、史学方法的未来	(142)
第八章 具后现代意识的重要中国史著作举隅	(149)
一、颠覆既有的历史刻板印象	(149)
二、具后现代意识的史学方法论	(155)
三、以后现代主义拯救历史	(160)
第九章 中国史研究的后现代倾向	(170)
一、后现代主义相关的国史论著介绍及讨论	(170)
二、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介绍及讨论	(181)

后现代史学要理问答	(194)
参考阅读书目	(204)
中西人名对照	(212)

导 论

如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从北京、纽约到巴黎,都能感受到它的影响。这一激进主义也反映在西方学术界。自那时以来,西方文化便开始为一股思潮所缠绕,其代表人物是极具批判性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让·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等人,而他们的矛头则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化。到了70年代,人们开始将这一思潮统称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其影响力也开始触及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受此影响,许多自文艺复兴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信仰和概念开始为人所怀疑。

到了目前,这一趋势似乎呈现一种淡化的趋势,有人甚至开始讨论何谓“后现代”^①。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退却,正好表现出它的一些思想概念,已经开始潜移默化,逐渐在人们的态度(包括对待治学与生活)上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蔓延来看,也有一个过程,开始在人类学、社会学,然后到教育学、政治学,最后才到历史学。可以这样说,后现代主义疑问和挑战的最后堡垒,就是西方的现代历史学(原因详后)。更确切一点说,后现代主义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Historiography)的理论和实践及其所阐明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观念。虽然有一些关注史学理论的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有所关注,但西方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当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②

这一时期的中文学术界,特别是文学界,也已经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出版了不少翻译和研究的著作。如果要想作一个比较的话,可以发现这么一个不同:台湾学界更注意经典原著的翻译,而大陆学界则偏向于评述,并多数持一种批判态度。^③这里面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又反映了学风的不同。

由于本书讨论的角度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历史研究的关系,因此便有一个

侧重点和观点的问题。换言之,我们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只是其在历史学上的表现,并不能代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全部。依我们看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西方能产生并发生影响,有其复杂、深远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因此我们不能将其孤立起来,仅仅抓住它的一些极端化的表现,如它所提倡的一些观念,攻击一番,然后弃之一旁,以为这样便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正好是现代世界目前所面临的或者即将面临的关键所在。譬如如何处理和面对种族、民族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甚至国家内部各族裔的交融、会合,两性之间的关系等,必将是 21 世纪人类历史发展所需要处理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看起来没有什么建设性,但却促使我们对这些问题作出不同的思考,因而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

一、现代历史编撰学的缘起

要了解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冲击,我们需对现代史学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略作评述。首先要说明的是,“现代”(modern)一词有时也译作“近代”,在中文史学界往往是指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如果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那么从 1910 年(1911 年或 1919 年)开始,则进入了一个现代史的阶段。但在西方史学中,这一区别并不存在;所谓“现代史”往往概括了一个更长的时期,从文艺复兴一直到今天。即便要对这一长久的历史时期有所分段,也只是用“前现代”(premodern)这样的词,并不舍弃“现代”。但既然有“前现代”,自然也会有“后现代”(postmodern)。由此看出西方人对“现代”一词的偏好。

的确,“现代”对西方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着眼,可以这样说,没有“现代”,也就没有西方。因为所谓西方和东方或其他地区的对比,正是世界历史走向“现代”的结果。在这以前,各地区的文明之间虽有一些交往,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各自为政、独立发展,因此“东方”、“西方”等名词,只具局部的含义,并不包含世界史的意义。如,中国古代的所谓“西方”指的是印度,而“东方”则指的是日本和朝鲜。同样,西方人的“东方”,也主要指的是现今东地中海和土耳其一带,即爱琴海与小亚细亚。只是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西方人的“东方”概念才逐步扩大,有了“近东”、“中东”和“远东”之分。于

是,处在“远东”的中国人和东亚人,也开始将原来的“西方”概念延伸,用来专指欧美。

东、西方概念在地理上的扩展、延伸,是“现代”所带来的,也即“现代化”的结果。因此,所谓“现代化”,究其本质而言就是“西方化”,即西方文明向全世界的扩展。“现代”这一提法,最早是西方人划分自身历史的一个词,见于文艺复兴时代,由彼得拉克(Petrarch)发明,用来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对照,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种将历史一分为三的做法,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观念。那时的人文主义者以复兴古典希腊、罗马文明为己任,认为随着古典文明的恢复,历史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期,即“现代”。^④他们对历史的这种“三段论”的认识,为以后的西方历史学家所继承、改造和发扬,成为西方现代史学的主要理论前提之一,也是他们认为西方不同于和领先于其他地区的主要原因。自20世纪以来,中文史学界受此历史观影响,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也照搬古代、中古(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期,可见“现代化”即“西方化”此言不差。

应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观,还是一种历史循环论。自那时开始,西方史家对古代与现代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直莫衷一是,争论不休。最常见的论点是,古典时代以文学艺术见长,而现代则以科学技术占优。^⑤直到18世纪科学革命完成以后,西方人才对现代这一时期的优越性开始表示了信心。那时开始的启蒙运动,正好反映了科学革命对人文思想的影响,西方人的历史观也开始产生了新的变化。从表面上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仍然遵循文艺复兴的“三段论”历史分期,但不同的是,他们的历史观已充满自信,认为现代无疑是一个进步、光荣的年代,不再为古代、现代的孰优孰劣而犹豫不决了。换言之,到了启蒙运动的时代,历史的进步观念开始得到确立,“现代”不仅成为过去各个时代曲折进步的结果,而且它本身也获得了研究的意义。比如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史》中,便认为17世纪的法国,集欧洲文化之大成,代表了文明发展的高峰。

这种将过去视为现在的铺垫的认识,也是启蒙时期历史观的重要方面,可以用“目的论”(teleology)这一术语概括。在启蒙思想家眼里,历史的演变不但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而且该过程本身具有深刻的意义,呈现内在的一致性(coherence)。因此,每个时代虽然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但就总体而言都为历史进步做出了贡献。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变化有一个形上的意义,即所谓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或“大叙述”(grand narrative)。正是在此认